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7.04.004

美国“后9·11”战争书写的真实阈限与伦理可能 ——论菲尔·克莱的《重新派遣》

但汉松

内容提要: 菲尔·克莱在短篇小说集《重新派遣》中展现了“后9·11”语境下美国战争书写的一条独特进路: 不再重复奥布莱恩、海明威等人战争文学正典中的“绝望”和“创伤”程式, 也拒绝将当代伊战的个体经验贴上“不可言说性”的神秘主义封条, 而是以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伦理表达, 寻求战争经验和日常生活的最大通约性, 从而寻求两者的交流潜能与道德对话。

关键词: 菲尔·克莱 《重新派遣》 战争故事 后9·11

作者简介: 但汉松,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英美文学博士, 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现当代小说。本文受到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小说中的9·11叙事”(13CWW021)资助。

Title: The Limit of Authenticit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Ethics in American Post-9/11 War Writing: On Phil Klay's *Redeployment*

ABSTRACT: Phil Klay in his debut short story collection *Redeployment* paves new ground for American post-9/11 war writing. He refuses to repeat the classic paradigms, exemplified by authors like Ernest Hemingway and Tim O'Brien, which are solely concerned with desperation and trauma. Nor does Klay label the contemporary Iraq war as "some mystically unspeakable experience." Rather, he seeks for a pragmatic ethics that takes one's war experience and daily life as commensurable, and consequently realizes the communicative potentials and ethical dialogues betwee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Keywords: Phil Klay, *Redeployment*, war writing, post-9/11

Author: Dan Hansong <dhs@nju.edu.c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English

Departmen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23).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对于27岁的伊战退伍老兵菲尔·克莱(Phil Klay)而言,201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或许是一份早到的荣誉,因为年纪轻轻的他凭一部短篇小说集(同时也是其处女作)就问鼎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学奖。然而,对于“后9·11”时代涌现出的伊战文学而言,这却是一次姗姗来迟的“加冕”。《黄鸟》(*The Yellow Birds*)、《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行走》(*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尸体清洗者》(*The Corpse Washer*)等这些优秀小说虽然也曾经进入终选名单,但距离登顶始终还差一步。甚至在2012年,美国学者依然认为,和佳作迭出的“9·11小说”相比,美国文坛尚未产生一部“标杆式作品”来反映入侵和占领伊拉克这一重大事件(Luckhurst 713)。那么,为什么在伊战爆发11年之后,关于该题材的文学作品才在当代美国文学中获得经典性的肯定?为什么这样一次标志性的文学肯定,会颁发给克莱的这部作品?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进一步思考作为全球反恐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伊战如何陷入了文学再现的麻烦,以及克莱如何以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美学和伦理立场来有所突破。

一、伊战的再现悖论

伊战小说相对于其它类型“9·11”小说的滞后性,首先源于这场海外战争的特殊性。西方联军从2003年3月20日开始军事入侵行动,仅仅花了21天的战斗,就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同年5月1日,当布什总统驾驶战斗机在“林肯号”航母降落,并在“使命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的条幅下完成了极富争议的获胜演讲。然而,伊拉克战争远未结束,这个国家此后陷入了巨大动荡中,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宗教矛盾愈演愈烈,让美国人此后陷入伊拉克政府军和叛军的缠斗中长达八年之久。菲尔·克莱、本·方丹(Ben Fountain)、斯南·安东(Sinan Antoon)、凯文·鲍尔斯(Kevin Powers)等人的伊战小说反映的都是这个战争僵局阶段——激烈的城市攻防战早已结束,剩下的使命是美军小分队从基地出发,在叛军出没的城市巡逻和清剿,应付偶发的街道炸弹和狙击手袭击。

因此,伊战并不像是美国所经历的两战世界大战,也迥异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深陷的越南战争。基于美国绝对的军事和科技优势,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不是这个国家对赌国运的“全面战争”(Total War)。与塔利班、伊斯兰国和其他叛军的作战并无胜负悬念,双方悬殊的实力让这场不对称的战争成为了低烈度的消耗战。美国未像越战时期那样强制征兵赴伊拉克、阿富汗参战,十多年间的阵亡人数仅为越战的十分之一,这也让漫长的伊战并未在国内民众中获得太多关注,既没有60年代那种剧烈的反战浪潮,也没有40年代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那种同仇敌忾。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是迫于“9·11事件”之后的复仇冲动,虽然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事后证明子虚乌有,但驻扎伊拉克维持稳定和收拾残局成为了美国不得不做的脏活、累活。正如迪尔(Patrick Deer)所言,美国并未赋予伊战某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宏大修辞:它既不是二战这类的“正义之战”(the good war),也不是冷战、越战那样的“对抗共产主义的战斗”;相反,它是全球反恐框架下的“永恒之战”(the forever war),也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Deer 58)。

伊拉克作为当代战争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对这个事件的历史叙事在美国文化中面临着诸

多麻烦。相当长时间以来,关于伊战的电影几乎成为了票房毒药(Barker 112)。李安导演改编的伊战小说《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行走》在全美仅获170万美元票房,甚至连《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 2008)和《猎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 2012)这样优秀的奥斯卡获奖电影也票房平平。唯一在好莱坞叫好又叫座的伊战题材电影,只有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传记电影《美国狙击手》(*American Sniper*),而个中奥秘显然与该电影所弘扬的战争英雄主义这种主流价值观有关。相较之下,文学虚构作品的创作虽然较少受到市场和商业机制的掣肘,但小说家在面对伊拉克战争时也有着自身的艺术困境,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用文字来想象和讲述伊战中呈现的个体生命形态。或者更具体地说,“对战争进行审美再现所做的伦理批评是基于两种力量的撕扯,一个是需要去见证和记录,另一个则是需要迂回和绝境,或者说,需要将再现创伤暴力的不可能性凸显出来”(Luckhurst 714)。

就现在而言,大多数伊战小说都是以美国士兵为视角展开的(一个罕见的例外是伊拉克裔美国作家斯南·安东,他从普通伊拉克人的视角,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尸体清洗者》)。然而,即使从这场战争的具体执行者出发,这种虚构的使命依然困难重重,因为伊拉克战争中没有索姆河战役的绞肉战场,也不是越南丛林的艰难鏖战,而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一次“高科技媒体的景观”(Deer 58)。鲍德里亚在20世纪90年代初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海湾战争将不会发生》、《海湾战争此时并未正在发生》和《海湾战争没有发生过》。鲍德里亚并不是质疑“海湾战争”只是纸上谈兵或一场虚构,而是认为它的空袭战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种超真实的拟像,甚至进一步预料到未来的战争会更加走向虚拟化、数字化。无人机战术(Drone Warfare)在本世纪的伊拉克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军作战人员可以在阿帕奇直升飞机上或军事基地内的大屏幕前,对需要摧毁的军事目标实行“外科手术式”遥控精准打击。这样的战争体验对于执行者来说,就“如同玩一个类似《文明》的电脑游戏,是一种科幻体验”,而对于指挥部显示屏上那些被炸弹消灭的敌人,美国军方甚至还有一个俚语,即“拍臭虫”(Ahmed 3)。如果参与战争只是一种高度虚拟的体验,战争小说及其叙事者该如何超越这些高科技战争视频剪辑的拟象,从而企及战争文学叙事中追求的“真实”?

如果说战争的虚拟化、媒介化,是克莱这样的当代战争小说家不得不面对的挑战,那么还有一个更加隐而不显的麻烦,即该以怎样的道德立场来进行这类战争的生命书写?以越战题材小说《士兵的重负》而闻名的奥布莱恩(Tim O'Brien)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真实的战争故事从来都不关乎道德”(65)。这个从越南战场归来的老兵甚至决绝地认为,如果读者在战争故事中读出了提振人心的力量,那他肯定是受到了巨大诓骗,因为在这样的作品中本应毫无美德可以呈现,能如实提供给读者的,不过是那些淫秽与邪恶的战争真相。在《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这样的当代经典战争叙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对人性之恶、战争之荒诞毫不妥协的再现。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国际法理与战争伦理争议,从战争酝酿期开始就没有停止。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的违禁化武证据被证明是骗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小布什和布莱尔在积极推动战争时的“阳奉阴违”,已经被大卫·海尔(David Hare)入木三分地写入政治讽刺剧《糟糕事常有》(*Stuff Happens*)。

因此不难想象,当凯文·鲍尔斯和布莱恩·特纳(Brian Turner)以小说、诗歌和自传为体裁来续写战争经验,他们更倾向于站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对面,对伊拉克战争做一种诗性凝视,暴露出战场废墟中巨大的伦理沉默。尤其是在特纳的《我作为异国的生命》(*My Life as a Foreign Country*)中,他将自己在伊拉克和波斯尼亚的参战经历,与祖父参加的二战、父亲感

受的冷战和叔叔亲历的越战进行了并置和拼贴,从而让伊战获得了某种战争文学的普适性。特纳的标题也让人不禁想起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在他国”(“In Another Country”),两者似乎都在强调战争经验对于士兵心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都会让士兵成为永远无法归来、无法再度融入日常生活的异乡客。甚至可以说,在美国战争文学的经典中,从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再到战后二战文学的“黑色幽默”和越战文学的奥布莱恩式风格,一直贯穿着某种类似的“绝望”程式:所有宏大叙事的意义都被消解,爱国主义或英雄主义的修辞沦为揶揄的对象,身体在战场的殒灭或战后的心理创伤让道德化叙事变成了审美的敌人。

二、叙述“真实的”伊拉克?

虽然《重新派遣》也脱胎自美国战争文学的传统,但它无意简单重复这类文学正典中的“绝望”程式。克莱首先反对强加于士兵身上的那种与“绝望”、“创伤”相关的刻板印象,他甚至专门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质疑公众对于伊战老兵的同情目光。在他看来,不同军人在海外战场的经验是高度差异化的,个体间的适应能力和感受力也有千差万别,未见得所有老兵都必然会罹患“创伤后遗症”(PTSD),也不是所有参战者手上都沾有伊拉克儿童的血(Klay, “Treat”)。在克莱的战争文学建构中,伊拉克战争既不是教科书中那些王侯将相们唱主角的历史事件,充斥着大国博弈的算计和伤亡人数的冰冷数字,也不是一个被无限诗化的关于极端暴力与死亡的象征物。《重新派遣》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以写实主义的态度,将他亲历的伊拉克安巴尔省视为有着众多面相的战争现场。书中收录的十二个短篇不仅代表了十二种职业分工的士兵(如殡葬部士兵、心理战特种兵、随军教士、外事官员、炮兵、财务后勤兵、军队公共事务主任等等),也分别构成了十二个精小的切面,具体而微地映射出伊战这台巨大复杂的后现代机器的运转。克莱让读者意识到,他笔下形形色色的美军士兵人物所参与的,其实是一个有着严格分工和科层制度(bureaucracy)的帝国驻外机构,正是这些职责各异、体验各异的士兵形构了这个让美国深陷八年半之久的反恐战场。

他们被派遣和重新派遣到这样的战场,需要不时面对恐怖袭击或与叛军短兵相接,但同时伊战对他们也意味着千篇一律的日常事务——练习炮弹装填或擦拭炮筒,写电子邮件和上级讨论是否给伊拉克儿童发棒球帽,给美军误伤的市民发放抚恤金,休息时在营地玩德州扑克或在浴室里手淫……克莱笔下战场生活的这种庸常感,意味着无休止的重复、乏味与空虚。与之相对的,则是交战时枪炮的暴力杀戮,是战地上最为狰狞、污秽的死亡。在《肉体》中,那个在美军殓葬部门负责清理尸体的主人公,讲述了某具伊拉克叛军的尸体如何在搬运中被卡车后门滑破,然后“腐臭的血、体液混着内脏像杂货般从一只湿纸袋底部漏下来。‘人汤’正好泼在他的脸上,顺着两撇胡子往下滴”(Redeployment 54)。战争生活的无聊与恐怖就这样成为了伊战的一体两面,两者对于《重新派遣》中的生命书写同等重要,因为正是两者的交替才构成了每轮持续10—12个月的美军派遣生活。克莱这种将伊战的零光片羽分解于众多短篇,并以统一的主题加以贯穿连缀的做法,与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的“群像”刻画颇为相似,它的叙事优势之一便是可以多视角地展现这个海外战场的参差多态。对于奥布莱恩而言,战争故事的“真实”是对于战争中极暗地带的忠诚再现,但克莱讲述的战争却拒绝呈现某种单态的“真实”,因为他要给读者看的是一段有着广泛色态差异的光谱。更进一步说,奥布莱恩的战争叙事美学所关注的真实阈限,是如何逼近战争作为极限

经验 (liminal experience) 在恐怖与暴力层面的不可言说性, 而克莱的叙事美学采用的是提喻 (synecdoche) 与枚举, 他在真实维度的诉求不是同质的现实深度, 而是足够复杂的差异性。

与之对应的, 是组成驻伊美军的那些生命个体所体现的分裂的战争态度, 他们或犬儒、或坚强、或真诚、或绝望、或邪秽, 在多元文本中呈现出一种巴赫金式“众声喧哗” (heteroglossia) 的思想结构。在《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这篇故事中, 鲍勃持有的是一种存在主义立场: “我们之所以在伊拉克打仗, 是因为我们在伊拉克打仗。他不追问原因, 也不奢望能有所作为。他唯一在乎的是 25 万美元年薪和三次带薪假” (78)。另一个叫辛迪的女兵, 作为美军扶助伊拉克妇女计划的顾问, 她“是这场战争的信徒, (认为)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 (78)。还有一些士兵则经历了信仰的幻灭。在《火窑中的祈祷》中, 一位陆战队员告诉随军牧师说, “这他妈毫无意义……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穿过一条街, 触发炸弹, 第二天又穿过同一条街, 而他们已经埋好了新的炸弹。就像是, 你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人都被炸死……杀人是唯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不只是浪费时间” (147—48)。从人物设置而言, 只有《除非伤在该死的胸口》中那个公共事务副官——“职责是处理应内的文书: 伤亡报告、通信、授奖、个人评估报告、法律问题” (241)——与克莱本人的军队经历相符, 但这样一个原本可以发展为自传式虚构的声音, 在十二个故事中也未居于核心位置, 而是和其他人物的声音与意识平行并列。克莱之所以要故意疏离自我视角的伊战叙事, 或许是因为他明白公共事务科的文职士兵与海豹突击队的特种兵虽然都身处伊拉克前线, 但却注定无法以相同的方式来把握这场战争的真相。他们之间需要通过接力讲述来交换真相, 他们各自的盲点或局限或许在别人的故事中就能得到克服。

所以, 在克莱的伊战故事集中, “真实” 是一个生产性 (productive) 的过程, 而不是某个神秘的、静止的存在之物。从文学技巧上说, 克莱不缺乏《黄鸟》那种以诗人视角讲述战场生存之谬的能力, 也完全能像《比利·林恩漫长的中场行走》那样, 耽溺于言说战争亲历者和普通民众的巨大鸿沟。但是, 克莱似乎厌倦了像父辈作家那样去重复战争文学中的“战场诺斯底主义” (combat Gnosticism), 即将战争经验变成了当事人某种高级的隐秘知识, 不仅不可言说, 也不可见证 (Campbell 204); 或者, 就像《达洛维夫人》中的赛普蒂默斯 (Septimus), 个人化的战争记忆构成了永恒向下的漩涡, 只能不断演绎出幻灭和崩溃。对这个毕业于常青藤名校、热衷冰球和拳击的年轻作家来说, 遥远的伊拉克是一个帮助他和笔下的普通美国士兵认识他者和死亡——死亡, 即列维纳斯意义上的绝对他者 (金惠敏 49)——的生活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 克莱以战争机器为棱镜透视形形色色的军队生活, 目的是为了讲述这种他者的无限性 (infinity), 而非他者的总体性 (totality)。这是克莱对于美国战争文学本体论的一种背离, 但却与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有着深刻的契合之处。

三、战争中的肉体与伦理

无论是军队中庸常的、琐碎的具体经验, 还是不可叙述的、断裂性的个体创伤体验, 叙述战争经验都构成了克莱及其笔下人物“生产”这种他者的“无限性”的途径。这种叙述是一种言语行为, 其操演性 (performativity) 并不体现在讲述的内容距离真实有多远, 而是在于这种叙述本身可以让事情发生。换言之, 在克莱看来, 在士兵之间、士兵与平民之间叙述战争经验的“不可叙述性”, 比执着于战争对主体意识的不可修复的撕裂更具有伦理价值。

当然, 《重新派遣》中并不缺乏那些战争文学中常见的“叙述无能者”, 但克莱却避免以“创伤文学”的窠臼去呈现心理经验的断裂处叙述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在《战争故事》中, 克

莱不仅集中探讨了士兵向平民讲述战争的困难,也反身性地讽刺了将文学叙事作为治愈“创伤后压力症”的幼稚想法。因为在战争中受到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屠戮,《战争故事》中的詹克斯一直以来的态度是:“我从不讲战争故事”(213)。如果不是编造一些战争段子来泡妞,他也无法真正将碎片化的记忆组合,因为“很多记忆都消失了。什么都不剩。就像,系统崩溃了”(224)。两个来自纽约老兵团体的女孩来访谈他,试图借助作家工作坊来帮助老兵进行自传式写作,“通过写作来治疗创伤那种东西”(221)。詹克斯在女孩们的诱导下,逐渐敞开了心扉,开始艰难回忆导致自己伤残的那次爆炸袭击,尽管他只能记得“一道亮光”和“硫磺的气味”,然后是猛烈到来的“黑色”(225)。克莱并未乐观地暗示这种叙述疗法可以真正治愈詹克斯的心理创伤,因为在访谈结束时,詹克斯始终无法触及“他成长的故事,也不会谈起那个曾让他心碎的女孩”(235)。作者甚至通过叙述者“我”(詹克斯曾经的战友)来批评“老兵反战同盟和艺术家……为了一个他妈的舞台剧揭他的伤疤,像一群蛆一样啃他”,但采访者立刻反驳,“他们在我身上用过蛆……蛆能清理死皮”(233)。

如果说“蛆”这个比喻深刻解释了叙述战争对于士兵叙述者本人的正反效果,那么克莱更为看重的则是讲述战争故事对于社群的意义。简言之,叙述战争是社会中的一种共时的生产分工,每个士兵分享属于自己的战场经验,但整体达到的效果却是对不应遗忘的历时记忆的接力。在接下来“我”和两个女孩的单次对话中,读者意识到这样的叙述行动不仅针对詹克斯本人,还能帮助其他老兵(譬如“我”)重组自己的战争记忆,也帮助两个女孩去重新理解她们各自家庭中那些来自祖父和父亲们的战争故事,甚至可以帮助美国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中像《黑鹰坠落》、《野战排》、《拆弹部队》这样的经典战争叙事。因此,对于克莱来说,讲述和书写战争从来不是一个仅仅用于自我疗救的闭环,而是体现了文学的事件性,它指向那些接受故事的倾听者。《心理战》中的“我”和扎拉之间对话关系的演进,就体现了士兵与平民之间交换叙事的生产性。思想激进反战的扎拉起初要逼迫“我”承认自己在伊拉克屠杀平民的罪行,但在误会化解后两个人的交流逐步加深,“我”说出了自己作为埃及科普特人在9·11袭击之后的美国如何被误解和孤立,如何在战场上用热成像夜视仪观察一个受伤叛军慢慢死去的全过程,而扎拉这个来自巴尔的摩黑人家庭的女孩,也吐露了“后9·11”爱国狂热下的种族歧视如何影响了她改信伊斯兰教,反思了阿尔都塞、葛兰西这些左翼思想家如何影响了她的战争观。所以,和《重新派遣》中的很多战争叙述一样,施话者与受话者在这里都是可以互换的,他们在克莱的故事中并无主次之分,两者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意义的生成。

那么,为什么克莱会对战争参与国的士兵和平民之间的这种相互讲述抱有如此积极的信念呢?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作者对战争生命书写中的“肉体”有着一个二元的立场。首先,无论战争中的前线与后方、“我们”和“他们”甚至人和动物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肉体的脆弱性构成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对于列维纳斯而言,当他者的“脸”(不一定是人类的脸)向我们呈现时,它传递的就是生命的脆弱性和可伤害性,我们对这样的“脸”具有无条件的责任,即不应该用暴力方式去伤害它们,这也是列维纳斯非暴力伦理学的出发点(Levinas and Kearney 23—4)。类似地,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认为,“这种‘共同的’肉体上的脆弱性”(“common” corporeal vulnerability)构成了“人文主义的新的基础”(42)。但是她转而强调,这种对于“脆弱性”的社会共识并不会自然而然发生;相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一直在试图从公众视野中抹除他者的脆弱性。重新暴露并凸显这种脆弱性的,恰恰是暴力本身,它让我们在对死亡的悲悼中发现自己在社会中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通过反省他者肉体的殒灭来认识

人存在的意义和对于他者的伦理责任 (Butler 22)。

在标题故事《重新派遣》中, 克莱巧妙地书写了两类狗的身体: 前者是美国陆战队员射杀战场上舔食敌军腐尸的饿狗, “虽不是美国人的血, 但毕竟是条狗在舔着人血” (2); 后者则是主人公在派遣期结束回国期间, 决定杀掉自家即将老死的狗。狗以人肉为食, 这无疑提醒惯于食肉的我们人在食物链上的动物性存在, 而以人道主义为由击毙美国家中的老狗, 又会让“我”想到自己和战友在费卢杰的杀狗行动。这样的屠狗既是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 也是为了保全狗作为人类伙伴的尊严。克莱以极为专业的军事知识描述了人和狗在高速子弹面前的共同命运: “你的身体的主要成分是水, 因此子弹穿过身体就像石头投入池塘。它会激起涟漪……尤其当两颗 5.56 毫米子弹以超音速穿过的时候……你的两片肺叶都会穿孔, 胸前出现两个大洞。你必死无疑。但你一时还死不了, 还能感觉到血液满满充满你的肺” (15—16)。在克莱的笔下, 无论物种和国籍, 战争暴力下的死亡都具有这种冷峻的脆弱性, 于是也就构成了一种更为普适的对话基础。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对隐蔽的肉体脆弱性的讲述中, 我们才能质疑对于肉体等级性的划分, 从而构成了团结 (solidarity) 和共情 (empathy) 的一种基础。正如巴特勒在 9·11 之后呼吁的那样, “受伤即意味着人可以有可能会反思伤害, 发现它分布的机制, 发现还有谁也遭受了可渗透的边界、无妄之暴力的伤害, 还有谁被剥夺, 活在恐惧中, 以及这种伤害的方式何在” (Butler xii)。在《肉体》中, 那个负责殓葬的士兵在回乡后与女友再次肌肤相亲, 抚摸她的身体时, 被瞬间激发的就是这样的反思——“我”想到了在伊拉克接触的各种遗体, “我会掀起自己身上的一块皮肉, 再拽一下看着它拉伸。我会想, 这就是我, 不过如此” (67)。

关于“肉体”立场的另一面, 则是关乎这种脆弱肉体的伦理维度, 即这些肉身的主人是否可以在战争中成为道德的行为主体 (moral agent)。在《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黑色幽默中, 士兵的自由意志显然是一种荒诞的幻象, 但是对于伊拉克战争这个完全由志愿服役的美国公民参与的现代战争中, 克莱并不认为士兵沦为了美国反恐战略的走卒与棋子。比如《火窑中的祈祷》里的罗德里格斯, 因为连队战友死伤对于个人良心的重压, 向随军教士忏悔说: “日复一日, 我别无选择。他们把我派出去送死, 这他妈毫无意义” (148)。但牧师却提醒他, “你认为你能控制发生的事, 你不能。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动” (151)。这其实代表了克莱的某种立场: 即使士兵知道这场战争的发动并非无可指摘, 也清醒明白它给伊拉克人民带去的深重灾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士兵作为伦理主体在这样被指责为“非正义”的战争中就应无所作为。克莱无意在“正义战争” (Just War) 的政治概念中绕圈子, 他只是更习惯在一种实用主义伦理的立场上, 审视笔下的这些伊战“小人物”们所面临的道德选择。当代伦理学已实现了康德之后的实用主义转向 (the pragmatic turn), 当代伦理学家已不再坚守普适不变的道德律令, 而是认为“道德反思必须和所有真正的研究一样选择起点, 即 *in media res* (从中间开始), 从切实的生命经验纠缠中出发” (Fesmire 28)。正因为如此, 克莱选择的并不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展开, 而是在费卢杰这个危城的每分每秒, 由具体的人在具体而微的情境中去应对——是否相信审讯室这个可疑的伊拉克人用汽车蓄电池电鱼的说辞? 是否在检查站面对一辆没有及时减速的轿车时, 让手中 M16 的射击再推迟几秒? 是否宁可得罪五角大楼的官僚, 也要如实汇报在伊援建项目的愚蠢昏聩? 甚至连杀戮本身也存在伦理选择的空间。在《重新派遣》中那个最后不得不扣动扳机杀死自己年迈的狗的“我”, 明白只要两枪射击左右肺并间隔足够的短, 就会保证它“当场死去, 不必经历垂死的挣扎。只有震惊, 没有痛苦” (16)。每个拥有杀人武器的士兵, 虽然都有同样的武力升级规程来决定对手的生杀予夺, 但却可以在自身的情境下, 以自己

的伦理法则来做出抉择。每个这样的选择,都在真实地塑造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战场生灵们不同的道德脸谱。

结 语

克莱在书中特别引用了哲学家的一句话:“阿甘本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完全受制于刺激”(269)。如果人类可以超越自己的动物性,即使是面对战场这样极度恐怖的外部刺激,也能克服条件反射去做出选择,那么他就不会只是一条巴甫洛夫的狗,而是有自主能力的道德主体。这里,我们不妨回到巴特勒,重温她关于身体政治的愿景,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启迪。这位性别理论家说,“我的身体既属于我,也不属于我。自进入到他者的世界之初,身体就携带了他们的烙印,形成于社会生活的坩埚中;仅仅在未来,带着某种不确定性,我才能宣布拥有自己的身体,假如我真的这么做的话”(Butler 26)。正因为如此,巴特勒才将身体的自我化(individuation)视为一种成就(accomplishment),而不是前设(presupposition),它甚至未必会如愿实现(26)。克莱的战争故事在书写生命肉身时,就秉持这种谨慎的乐观。它比《士兵的重负》更真实吗?笔者无意评判,但至少前者并未将战争的意义做绝对化的神秘悬置,它并不必然高于、也绝不低于日常生活的恐怖。在《重新派遣》中,战场只是提供了一个处所,让我们去讲述人性的软弱和坚强。直面当代战争经验的平庸与多义,直面战场熔炉对个人良心的不同锻造,或许这才是克莱眼中战争叙事不应回避的道德使命。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hmed, Akbar. *The Thistle and the Drone: How America's War on Terror Became a Global War on Tribal Islam*.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
- Barker, Martin. *"A Toxic Genre": The Iraq War Films*. London: Pluto Press, 2011.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Verso, 2004.
- Campbell, James. "Combat Gnosticism: The Ideology of First World War Crit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30.1 (Winter 1999): 203-15.
- Deer, Patrick. "Mapping Contemporary American War Culture." *College Literature* 43.1 (Winter 2016): 48-90.
- Fesmire, Steven. *John Dewey and Moral Imagination: Pragmatism in Ethics*. Indianapolis: Indiana UP, 2003.
- Jin, Huimin. "The Infinite Other: On a Key Concept of Levinas." *Foreign Literature* 3 (2003): 46-53.
- [金惠敏:《无限的他者——对列维纳斯一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第46-53页。]
- Klay, Phil. *Redeployment*. New York: Penguin, 2014.
- . "Treat Veterans With Respect, Not P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3 May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treat-veterans-with-respect-not-pity-1400856331>>.
- Levinas, Emmanuel, and Richard Kearney. "Dialogue with Emmanuel Levinas." *Face to Face with Levinas*. Albany: SUNY Press, 1986.
- Luckhurst, Roger. "In War Times: Fictionalizing Iraq."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3.4 (Winter 2012): 713-37.
- O'Brien, Tim. *The Things They Carrie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9.

(责任编辑:朱雪峰)